

# 笔谈“抗日战争与沦陷区研究”

**编者按:** 2010年1月3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联合举办的“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编辑部、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安徽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十多个高校和科研院所的40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学者围绕抗日战争与沦陷区问题研究中的民族主义话语、现代化理论、沦陷区民众生活实态、民众心理、研究方法、实证调查、影像资料、抗战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等主题展开讨论和交流。本组笔谈均选自此次会议。

## 荣维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如何推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研究

已故史学前辈王桂林先生曾经对抗日战争的形态做过这样的概括,即一个战争、两个战场和三种政权。一个战争不必解释;两个战场是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三种政权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国民党统治区政权和沦陷区政权。在这样的形态之下,抗日战争历史成为了一个系统的整体。既然是系统整体,那么在这个系统整体之下的各个方面之间,明显地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

以往,人们比较容易地注意到日本侵略与中国抗日之间的关系,因为这是战争的核心问题。相关研究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等。其后,人们又开始注意到两个战场之间的关系,因为战争的进程是由两个战场共同推动的。相关研究包括两个战场战略指导思想的异同、相互配合的问题以及具体的战役等等。而对于三种政权之间的关系,虽然开始有人关注,但到目前为止,仍缺少足够的研究。一般来说,人们是把三种政权分别加以研究的。其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研究最早受到重视,随后国统区研究也受到重视。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出现沦陷区研究。到目前为止,相关研究包括沦陷区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但与前两个研究相比,这个研究是不充分的。而由于这个研究的滞后,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人们对于抗日战争历史规律的全面把握。如何推动沦陷区研究走向深入?我认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思考。

第一是视角问题。所谓沦陷区,是日本侵略过程中的必然结果,它的出现又与战场作战直接关联。但如果只是以此为视角,沦陷区的概念就等同于日本占领区了。在这样的视角之下,一切政治的、经济的、文化教育的研究,都是为了说明日本在占领区的殖民统治。这种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意义的,但也是不完全的。如果我们把视角扩大一些,看看日本的殖民统治到底对中国近代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可能还有不少问题值得思考。比如,经济统制与开发对社会发展走向的影响、文化教育对人们行为观念的影响,等等。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有台湾学者关注了这样的问题并发表了相关的研究,而当时并没有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在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中遇到了这个问题,虽然我不赞成日本学者的观点,但我认为我们不能消极地回避问题。

第二是方法问题。与研究视角相关的是研究方法,其实也可以这样说,研究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方法。以往沦陷区研究和其他研究一样,在方法上都存在着一个问题,即着眼于事物的

定性研究,而忽略或轻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逻辑关系研究。其实,有些事情的发生有着很复杂的原因,历史是合力的结果,所谓合力,就是指的这个。比如研究伪政权官吏,如果按照过去人们习惯了的伦理道德标准,战争中确实出现过很多汉奸。但是,充当日伪官吏的原因是极为复杂的,如果不去做具体的分析,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是二战中投敌者最多的国家。我提出这个问题绝非是给汉奸翻案,而想要从历史上找到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经验。

第三是资料问题。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资料,历史研究更是如此。从现在出版的著述来看,关于沦陷区的历史资料已经被大量发掘和运用,这些史料包括档案、口碑、报刊,其中也有大量的日文资料。这是我们取得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但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很显然的是,现有的资料已经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了。对于史料,无论是中文的、日文的、大陆的、台湾的,甚至是其他国家的,都需要我们去花大力气发掘和利用。

王续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民族主义、现代化(社会转型)理论与沦陷区史研究——沦陷区史研究的方法论思考

在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沦陷区史是一块特殊的领域,如何认识和研究沦陷区史,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认知立场和视角,作出了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形成了不同的话语和认识,这些话语和认识相互交织、交错,对认知和研究这块特殊的历史有益也有碍,以下略从方法论视角来梳理、辨识这些理论和话语,提一点沦陷区史研究方法的思考。

剑桥大学的近代史教授伊凡斯在《何谓历史学?》一文中说:“历史学除了追求真相之外,还有第二项基本特质,即它不只要重建、描绘过去,还要理解、诠释过去。”“解释与诠释在历史学里居于中心地位”。解释与诠释就需要理论及其话语,在沦陷区史认知和研究的理论及其话语中,除历史学自身的理论方法外,认知和研究者自觉和不自觉地运用的社会科学理论抑或意识形态及其话语,大体有4种:一为中国传统的大一统观或正统观话语,“伪×××”、“×伪××”等称谓即属此种,即所谓“汉贼不两立”;二为民族主义话语,“沦陷区”的称谓应属此种;三为现代化理论或社会转型理论,“传统、现代”、“社会转型”等为核心解释概念;四为殖民主义理论,以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支撑,主要体现在日本右翼学者为日本在中国殖民统治辩解和美化的一些话语。这4种理论或意识形态及其话语相应地形成了认知和诠释沦陷区史的4种“史观”,第一种是中国传统史观,其余三种都属近现代史观,且都是西方的。但从对沦陷区史研究上,这4种“史观”又存在复杂的关系和关联。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是相互对立的和否定的,民族主义和大一统观、现代化理论有关联,现代化理论和殖民主义理论在解释沦陷区史上也有关联。在当下中国大陆的沦陷区史研究中,现代化理论最受追捧,似乎是中性的,但实际也有它自身的局限,它可为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共用。

实际上,民族主义和现代化理论在沦陷区史认知和诠释上具有互补性,二者的结合或许会更有利于沦陷区史的研究。民族主义在沦陷区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所解决的是沦陷区史的基本定位,即谁的历史的问题,换言之即沦陷区的历史主体和主题的问题。毛泽东在1939年所写的《研究沦陷区》一文,开篇即谓:“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沦陷区是中国的和中华民族的,现代历史的主体是民族,现代历史的主题则是民族的活动与变迁。沦陷区史的特殊性和复杂性需要明确这一点。正如美国学者杜赞奇所指出:“历史研究的主题可以不断翻新,如王权、国家、阶级、个人、身份认同群体等,但其心照不宣的参照系总是民族。我们从来不怀疑我们所学的历史就是中国、印度、日本或法国的历史。民族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暗示专业与通俗的历史:它才是历史的支配主体。民族参照空间

从来就没有无辜地沉默着,它为所有‘自己的’的历史争夺疆土、人口和文化。”(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5页。)进而言之,民族主义解决沦陷区史的基本认知立场和原则问题,即历史价值观问题。“不论是作为历史学家,还是普通的个人,我们的价值观都是由民族国家所塑造的”。这是认识和研究的前提,从这种观点来看,沦陷区只表明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暂时在空间上被分割和撕裂,而在精神、文化和时间(长时段)上是一体的,全体成员(当然包括沦陷区的民族成员)无时无刻都为共同体的新生(重建)而共同奋斗。所以,只有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和话语,才能解决沦陷区史是谁的历史问题,也才能有效地辨识、抵制乃至戳穿殖民主义美化沦陷区的殖民统治,弥补现代化理论对沦陷区史认知的局限。

现代化(社会转型)理论,在沦陷区史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则主要体现在:它可以解决沦陷区史怎么样的问题,即沦陷区史的主体和主题的具体活动与变化的问题,尤其是在从传统向现代的演进过程中,沦陷区是如何变化、是一种怎样变化的问题;它能够使沦陷区史研究更加细化、更加着重于社会层面的变化和社会时代性问题,解决沦陷区史的中观和微观的历史认识问题,弥补民族主义某种泛政治化和宏大叙事的不足。总之,抗日战争史中的中国沦陷区史是具有国际学术价值的重要领域,理论和史实两个方面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从方法论上说,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理论及其话语的结合,或许对沦陷区史研究更能有所助益。

#### 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细化与定性——抗战史与沦陷区史研究的冷思考

在传统的宏大叙事背景下展开的抗战史与沦陷区史研究,对日本侵略的定性、对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歌颂及对国民党正面抗战的有限赞扬与批判、对日军暴行的道德谴责、对沦陷区经济无序与社会暗无天日的苦难描述,一直是国内抗日战争史研究的主题。这种定性研究的展开,有其时代背景及现实意义。然而,随着研究持续深入、相关资料大量刊布、国际交流增多和视角多元化趋势的发展,抗战史与沦陷区史研究的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定性,已经是这一领域研究不容回避的焦点所在。

如14年中日战争时期,日军在中国伤亡究竟是多少人?是以日方档案为主还是以中方宣布的战果为准?抗战初期日军迅速进展并夺取东部中国,以往多批评国民政府军作战不利,但是否客观考虑过中日两国在国力、军力及战斗力上的巨大差别?战时中共根据地选举时常高达99%投票率是否可靠?中国战场到底牵制了多少日军?中国战场在远东乃至“二战”战场中究竟地位如何?如果中国战场是主战场,1944年为什么会出现与“二战”各战场高歌猛进形成鲜明对照的“豫湘桂溃败”?何以中国抗战直至美军围攻日本本土、动用原子弹的背景下才有“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此外,如何看待长期被视为“兽性集团”的日军?由反战、厌战士兵组成的“日本反战同盟”又说明了什么?集团性屠杀的根源到底是日本文化的劣根性还是战争文化对日军的扭曲?日伪间关系是否只是简单的主奴关系?伪政权的运作过程是否毫无自主性?汉奸投敌原因诸多,心态各异,应该十分复杂,是否上层都是汪精卫、周佛海般投机,下层都如电影《小兵张嘎》里胖翻译般弱智?沦陷区1亿民众的生活实态、心态到底如何?生活环境是否仅以妓院、烟馆、毒品交易、烧杀抢掠、粮食配给即可概括?日军在华有“以战养战”的政策,在东北、华北、华南各地统治政策也不同,不管经济是否增长?工业如何进步?其目的并非为中国人谋福祉,但是否应有定性前提下的客观描述而非无视?

现代历史学的表述及定性,基本上是在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下展开的。客观地讲,在抗日战争史和沦陷区的研究中,基于民族、国家立场的定性也同样无法绕开。侵略战争中的日军

暴行,给中国人的道德层面及情感深处造成了最深重的伤害。时隔60余年,人们仍然难以排除此是彼非的民族情绪,去客观冷静地思考这段历史,中日两国关系及内政也时受其影响。此外,这段历史仍因日本难以彻底反思、中国经济崛起对日本的压力等背景,以及中国人牢记历史教训的思维而难以沉淀,也是中日两国“共同历史观”难以形成的关键所在。然而,强调求真品性的历史学,不能只满足于现实政治特别是民众情感的需求,而应站在超越道德情感与现实政治、反对一切战争、维护民族生存权及人权的高度,通过细化基础上的定性研究,澄清有关抗日战争史及沦陷区史研究中的传说、误区、不实之词,尽可能还原历史本相,促使人们在客观的基础上理性反思这场影响深远的战争。细化研究以扎实的史料、无可辩驳的证据为根本,是科学定性所不可缺少的基础所在,它可以给狭隘民族主义情绪降温,更可以强有力地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歪曲历史的论调。

### 陆发春(安徽大学历史系)论抗战时期对沦陷区的历史认知

沦陷区作为一个历史社会形态,主要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殖民占领和半殖民地统治地区。为什么要这样界定沦陷区?个人认为学界因受战争回忆录、抗战著述、各种教科书、辞典及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宣传等影响,关于沦陷区的概念一直模糊不清。大众对沦陷区的认知,既指日军占领区,也指伪占区;这些称谓与游击区、根据地、国统区等相伴而生。

尊重历史事实,重温抗战时期对沦陷区的历史认知,可能对我们今天理解性地研究沦陷区,更有参考价值。

第一,抗战期间出于对敌斗争的需要,国共双方对沦陷区的研究曾经积累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和研究成果。例如,1939年国统区安徽省政府举办青年培训班,培训到沦陷区对敌工作的青年骨干。在发放给他们的培训班讲义《沦陷区域之政治纲要》《沦陷区内的政治工作》中,首先告诉学员们什么是沦陷区,因为只有学员对沦陷区有充分的认识,才能更好地对敌斗争。笔者发现讲义中清楚地提出对沦陷区的认识要与对抗日战争的性质理解相联系,即“抗日战争是民族革命战争,因为日本是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战争,在中国则是为求国家民族之独立与生存的反侵略的革命斗争”。这种民族革命斗争的特性是“全民性”和“长期性”。在“对沦陷区域的认识”章节中,概括了侵华日军实行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政策的特点,具体剖析了日军在沦陷区殖民统治的“野蛮残害”、“以华制华”、“怀柔愚华”、“欺骗榨取”、“麻醉毒化”五大表征。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战初期即注意到要加强对沦陷区的认识和研究。1939年,在华中、华南大片国土沦陷后,延安专门成立了“时事问题研究会”,沦陷区问题是该会重点探讨的中国抗战四大问题之一。该会在出版的《日本帝国主义在沦陷区》一书中,分为敌人在沦陷区的经济侵略、敌人在沦陷区的政治进攻、敌人在沦陷区的暴行三编,共计20章。该书剖析了侵华日军在中国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沦陷区的经济和政治统治方式,揭露了日军通过操纵伪满、伪蒙疆、伪临时政府和汪伪政权等,实施奴化教育、移民政策、征兵政策、宣传政策、伪军政策等诸多手段,以图达到殖民控制中国的侵略目的。毛泽东在为该书写的《研究沦陷区》序文中说道:“中国沦陷区问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死问题。在目前阶段内,集中精力侵略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确定政策。”“在这种情形下,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在这个问题上,有敌人的一面与我们的一面。在我们的一面,是如何支持游击战争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不待说是十分重要的。在敌人的一面,是敌人在沦陷区已经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研究这个问题,乃是研究前一个问题的起点,不了解敌人的情形,我们

对付它的方法是无从说起的。可是在这个方面,在沦陷区中敌人干了些什么并将要怎样干这个问题方面,抗战干部中没有研究或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这就指明: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唤起注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了。”据此看来,在抗战期间无论是出于对敌斗争需要或其他原因,对沦陷区认知是一个已经成型的、反复提出的历史认知知识元,也是不能绕过的历史知识形态。

第二,清醒地意识到抗战时期对沦陷区的认知,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党派的政治价值判断。抗战期间国共双方对敌占区、伪政权的解读和对战争性质、战争进程、战争前景的看法等涉及“沦陷区”的表述,以及以沦陷区同胞为对象的诸多“告沦陷区同胞书”、“告沦陷区民众书”等,都有明显的政治价值判断于其中,因此在当下的有关沦陷区研究中,要全面尊重历史事实,不能淡化政治价值判断。例如,蒋介石在1938年八一三周年之际发表的《告沦陷区民众书》就是一个代表国民党中枢的政治宣言。1943年10月10日,朱德等代表八路军发表《告沦陷区同胞书》表达的是中共对抗战进程和前景的看法。另外,毛泽东在前述《研究沦陷区》一文中,指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敌人侵略的方式,基本上已经转到政治进攻与经济进攻两方面。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我国的抗战经济。为达其经济进攻之目的,彼需要举行对我游击战争的‘扫荡战争’,需要建立统一的伪政权,需要消灭我沦陷区人民的民族精神。所以沦陷区问题,成了抗战第二阶段——敌我相持阶段的极端严重的问题”。基于对敌斗争形势的分析,毛泽东认为:“敌我相持阶段,在敌人,是确保占领地并准备进一步灭亡全中国的阶段,在中国,是确保未失地并准备收复沦陷区的阶段。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我们为了确保未失地,为了收复沦陷区,不能不从各方面有所准备。而最积极的支持游击战争,改革国内政治,乃是破坏敌人计划实现我们计划的两个大政方针。”清楚地指出了对沦陷区认知和研究的旨归是为抗战服务、为政治斗争服务。

翁有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从现代革命运动的角度考察和认识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有很多的子系统,如抗战时期的军事、政治、外交、经济、教育,抗战时期的中国、日本及相关国家,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大后方、抗战前线、敌后根据地与沦陷区,等等。缺少了哪一个子系统的研究,抗日战争的研究就不够丰满。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过去被忽视或甚少研究的领域和问题逐渐受到学界的重视,如此次笔谈所确定的“抗日战争与沦陷区研究”议题,就是一例。对沦陷区历史的研究,以往虽也有不少成果,但仍处于抗日战争研究的边缘地位,整体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此次笔谈则为沦陷区的研究深入开展和引起学界关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契机。这是抗日战争研究范围拓展和内容深化的一个阶段性标志,是很有意义的。除了抗日战争研究系统本身外,如果把抗日战争研究放到近代中国历史转型和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的更大系统下来认识抗日战争,来认识沦陷区,我认为,也许同样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

抗日战争作为20世纪规模空前的现代革命运动,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第一,从性质来说,抗日战争是中国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现代“反帝”革命运动。现代“反帝”革命运动可以说由五四开其端,甲午战争以来被称颂为“文明国家”的外国殖民者至此而皆被视为“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成为中国人民必欲驱逐和打到的邪恶对象。由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运动,虽在实际上是一场“对内”“打倒军阀”的国家统一的革命运动,却也是在“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两大口号下号召起来的,“打倒帝国主义”也是国民革命运动的一

个目标。但国民革命运动由于完成“对内”“打倒军阀”的国家统一目标已竭尽其力,随之由于国共分裂,故不可能完成“对外”打倒帝国主义的任务。而抗日战争则是以打倒帝国主义为直接目标,因为不打败帝国主义,则中华民族不能生存于世界民族之林,非将其打倒不可。而且,抗日战争实际上主要是由领导国民革命运动的国共两党领导进行的,在历史事实和逻辑上均继承了国民革命没有完成的“反帝”革命任务,是国民革命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抗日战争这种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战争,与近代中国以往的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都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对外战争只可说是一场战争,而不可以称其为“革命运动”,而抗日战争固然是一场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同时又是一场革命运动,是一场有明确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理论的“反帝”革命运动,是一场必欲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取得民族解放和独立为任务的历史性革命运动。而这些,则是通常所称的战争不能承载的历史之重。

第二,从内容看,抗日战争对中国来说是一场深刻的现代社会改造运动,涉及到从伦理道德到社会结构的诸多层面。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辉煌文明的民族,在经历近代以来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打击、折磨和刺激而呈现出有的起而抗争、有的痛苦彷徨、有的消沉悲观、有的失节卖国的多重变奏,在抗日战争中则形成了忠奸不两立、敌我不同天的抗争与投敌的明显对立阵垒。抗战时期,在日寇残酷的侵略面前,某些民族失败主义者和殖民奴化主义者卖国求荣的面目彻底暴露于国人面前,但他们是极少数民族道德沦丧者,在敌人的刺刀下成立伪政府,受到国人的唾弃和历史的谴责;抗战阵营内领导抗战的国共两党各自通过电台、报纸、书刊和传单等现代媒体向广大民众贬斥、揭露卖国者的面目和本质、大力宣传和弘扬抗战光荣抗战必胜的民族决心和信念,促进了抗战前线和大后方广大军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觉悟的空前高涨;即使身困沦陷区者真正甘心附逆的亦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仍是“想中央、盼中央”,他们想的“中央”,从本质上说并不属于哪个党哪个派别,而是属于抗战阵营的抗战领导者。正是抗战中,重新铸就了中华民族的新的民族道德观念,在现代民族主义和传统爱国思想的交汇中形成了不畏日寇强暴、酷爱自由、舍生取义、刚劲不屈、独立自主的浩然正气和时代精神。正是在抗战中,中国人民在抗战的艰苦条件下实现并完成了社会组织的重构和整合,不但曾对立10年的国共两党重新联合共同抗战,即使那些在历史上被歧视、被边缘、被遗弃的社会团体和社会底层的民众也被组织到抗战的队伍中来,这是一场深刻的社会组织结构的变革和改造,通过这种变革和改造,中国摆脱或开始摆脱东亚病夫的中国、老朽的中国、一盘散沙的中国状态。这些现代性的、革命性的转变,正是在抗战中形成和开始形成的。

第三,从形式上看,抗日战争是一场现代的全民革命动员运动。抗日战争不是一般的民族间的战争,它是经过国共两党的广泛社会动员而形成的人民战争。这种战争的社会动员,是中国以往任何一次对外战争所不曾有过的,是以一种现代革命精神和革命理论动员起来的。这种革命理论认为,由于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和中华民族蕴藏的巨大物质和精神力量,以及国际上的有利条件,中国的抗日战争必然能够以弱胜强,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者。这种广泛而持久的战争动员,在中国的前线和大后方,在敌后根据地,甚至在沦陷区不屈服的人民中,都形成了陷日寇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由于战争动员,日本侵略者在一定时期内即使征服了中国的部分领土,却无法征服中国的人心,反而激起中国人民更加强大的抵抗力量。正是这种社会动员,使中国一扫以往尤其近代以来的历史惰性,在国共两党的动员下,各阶层、各党派、各民族高扬“精诚团结”的旗帜,地无分南北,士农工商男女老幼都被动员到抗战的洪流中来。尤其是以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农民,正如李公朴在华北抗日根据地观察到那样他们第一次“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中国,认识了抗战”,也“认识了几千年不曾

认识的自己,认识了自己的力量”。当年曾身为正面战场抗日军人后来成为著名历史学家的黄仁宇如是评说:“中国的抗战动员了三百万至五百万的兵力,在统一的军令之下,以全国为战场,和强敌作生死战八年,其情形已是洪荒以来所未有。”黄氏这里说的“动员”的兵力,主要是国民党领导的“正规”武装抗日力量,如果加上地方的抗日团队,被动员起来为抗战服务的广大民众,中共领导的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战力量,其数量和力量就更是“洪荒以来所未有”。抗战何以有“洪荒以来所未有”如此之大的力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抗战是一场现代的全民性革命动员运动有以致之。

张生(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南京大屠杀研究中民族主义的多面向

近几年的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以民族国家建构和民族主义勃发为背景的视角颇为盛行。这不奇怪,对南京大屠杀史的梳理,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比较容易得到通畅的解读。事实上,中西方的观察者在屠杀的当时,就已经注意到日军战争犯罪和暴行对促发中国民族主义上升的作用。个别的观察者,如德国驻南京大使馆政务秘书罗森,甚至因而提前7年断言日本将遭到可耻的失败,中国的抗日战争必将胜利。民族主义的视角,破解了“美国鬼子点名,日本鬼子执行”之类不经之谈,揭示了日军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性质和深层原因,激发了中国国民的爱国主义。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之所以能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显学”之一,与其强劲的民族主义内涵有极大的关联度。

但是,我们应当同时注意,民族主义本身是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因其“政治上正确”,具有“不由分说”的优先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的这种态度渗透到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进而形成内在的学术性紧张乃至冲突。

比如参与安全区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的许传音,后来也参加了伪自治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要职。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对伪组织的官员,通常冠以“汉奸”的定性,至少被认为有“通敌”之嫌,这也是许传音本人在1949年后命运多舛的主因。但因许传音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做了很多有益的贡献,这位伊利诺伊大学毕业的博士,在历史研究中的定位是正面的。不惟中国人如此,当时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方面站在同情中国人民、认可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上,对“二手”傀儡政府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引参加了伪政府的许传音为同道。悖论式的态度,即使在今天仍然无解。

“慰安妇”问题,是日本军队的、国家的重大污点。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在全世界都立场鲜明,认为是对人类的犯罪。南京大屠杀期间,王承典(西方人称为吉米·王)与安全区委员会有过合作,而且是最活跃的成员之一。特别是王取得日本军方同意,实现大米供应,获得较好评价。但是,王承典也参加了伪自治委员会的工作,特别是设立“慰安所”,召集以前做过妓女的妇女前去“工作”。在民族主义语境中,“慰安妇”当然是被彻底否定的,但在屠杀期间的南京现实环境中,被很多人认为可以减轻日军官兵对良家妇女的伤害。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中,具有绝对崇高位置的贝德士,也赞成此事。这使得对王承典的评价颇费踌躇。

其实,民族主义因其爱国主义的内核,成为近代以来所有民族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之一;而对民族创伤、受害经历的共同追忆,是民族主义构建的基本路径之一。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国民认知中日关系的首要因素,其历史研究价值,不待龟筮。因此,围绕对南京大屠杀的态度,必然形成原则性立场,南京大屠杀史本身,成为历史认知的标准之一。

这种情况,并非个别,纳粹屠杀600余万犹太人的历史,也是如此。任何否定、或变相否定 Holocaust(大屠杀)的人,必然被视为反人类、反文明,并已经上升为判定一个人政治立场和良知的绝

对性标准。同时,犹太历史学家发现,甚至在集中营里,也有少量犹太人充当“党卫军”的合作者,协助纳粹对犹太同胞实施工业化灭绝行动。这些合作者,很多人并没有逃脱被毒死、焚烧的命运。历史的复杂性,使得民族主义也会陷入失语的窘境。

所以,就南京大屠杀史研究而言,民族主义不是万应良方。各种研究范式的交替转换,说明历史研究绝非真空中建造企图通往绝对真理的象牙之塔,同时也反映了研究者对历史真相、战争中生命价值和人性的反复追索。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不断取得进步,其理在此。

曹必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应进一步加强对沦陷区教育史料的搜集和出版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内曾大肆轰炸、焚毁、占领学校等教育机构,给中国的教育事业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同时,作为政治的延续、军事的后援,日本侵略者曾在沦陷区内大力推行奴化教育,给沦陷区民众的心灵带来了长久的创伤。对于沦陷区教育的研究,自1990年代以后,在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005年人民教育社出版了4卷本200万字的《日本侵华教育全史》更是将国内沦陷区教育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沦陷区教育研究中还存在着许多薄弱的地方,如史料仍较匮乏、研究区域不够平衡、重宏观轻微观等等,都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加以重视和深化。笔者仅就进一步加强沦陷区教育史料的搜索、整理和出版,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任何卓有成效的研究成果,都是在充分占有可靠史料的基础上取得的,只有史料的突破,才能带来研究方面的新突破。由于战争和历史的原因,保存下来的沦陷区教育史料很不齐全,且分存于中国大陆、台湾及日本等地。因此,加强与日本、台湾相关机构及研究人员的合作,是进一步搜集、整理沦陷区教育史料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大陆地区所藏史料最为丰富,包括档案、图书、报刊、口述史料等方面。由于研究者的不懈努力,图书、报刊史料的搜集最有成效,并在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运用,这在东北沦陷区教育研究中尤为显著。而最有价值且十分丰富的档案资料则因种种原因,公布出版还很少。口述史料近几年虽有所开展,但毕竟已过去了六七十年,亲历者人数不断减少,搜集的难度将越来越大,且史料的真实可靠性也有赖引用者的鉴识。因此,档案史料应成为加强沦陷区教育史料搜集、整理、出版的重点。

大陆地区沦陷区教育档案史料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及各省市县及学校档案馆中,其中尤以笔者服务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最为丰富和全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是国内集中典藏民国时期历届中央政府及所属机构档案的国家级档案馆,收藏有民国档案180余万卷(宗),其中涉及沦陷区的档案资料主要集中在伪维新政府及其教育部,伪华北临时政府及其教育部,汪伪民国政府及其行政院、教育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其教育总署,重庆国民政府及其行政院、教育部等全宗中,其内容则包括日军对学校等教育机关的轰炸、焚毁和占用,教育损失及其统计,日伪教育方针、纲要、方案、法规,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其人员变迁,教师(员)的培训、检定及任用,教科书的编纂及审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各种教育会议记录,留学日本及赴日考察报告,历年《教育公报》教育概况、教育报告及教育统计,教育社团,日伪对教会学校的处置等等。近年来,虽不断有学者前来查阅,但除《日本侵华教育全史》曾大量引用外,其他学术成果引用较少。所幸,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等单位合作,已组织人员对该部分史料进行了整理和编辑,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相信该档案史料的出版,对沦陷区教育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另外,对于散落在民间的各种私人文凭、成绩册、课表,特别是课本等,也需要有心人进行搜集

和抢救。

### 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留日学生研究概述

在近代中国留日学生史研究中,抗战时期沦陷区留日学生的研究起步较晚,进展较慢,研究力量相对薄弱。日本学者川岛真在《日本占领期华北における留日学生をめぐる動向》(《中国研究月報》2007年8月号)一文中,认为除河路由佳等人编的《戦時体制下の農業教育と中国人留学生》(農林統計協会2003年)和大里浩秋、孙安石编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研究の現段階》(御茶の水書房2002年)等著作之外,1937年以后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几乎是空白。其实,由于中日韩等国学者的努力,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留日学生的研究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如周一川的《「満州国」の留学政策と留日学生》(《アジア教育史研究》第8号)与刘振生的博士论文《「満州国」時代における元日本留学生と日本》(东北师范大学2004年)及其最近发表的《「満州国」日本留学生の派遣》(载大里浩秋、孙安石編《留学生派遣から見た近代日中関係史》御茶の水書房2009年)等论著,都是研究伪满洲国留日学生的代表性成果。笔者在《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政策探微》(《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中,简述了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研究的学术成果。笔者还在《笔谈: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留日学生研究评析》(《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中,曾概述了南京“维新政府”及其后汪伪政权留日学生的研究现状,此处不再赘述。虽然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留日学生研究的成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与抗战前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相提并论,但毕竟引起了学者同仁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不过,从整体上看,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留日学生研究仍存在较多不足和缺憾。

第一,相对于抗战前留日学生研究已经具体到各个省市县的留日学生群体,细化到留学日本的专业、学校,甚至每位留日学生的个案研究;沦陷区留日学生的研究大多以伪政权或沦陷区划界,粗线条地勾勒出伪政权或某沦陷区的留日学生概况,既不够深入,也不够细化,至今仍留有大量空白点。

第二,在沦陷区殖民教育史研究中,某种程度上忽视了留日教育的内容,导致许多大部头的沦陷区殖民教育史著作中,涉及留日学生的篇幅甚少。

第三,有关沦陷区留日学生的史料尚待进一步发掘利用。据调查,日本东洋文库藏有汪伪政权留日学生的大量史料,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珍藏的1940年以前中国留日学生资料较为丰富,日华学会编辑的部分《留日学生名簿》现藏于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目前,这些史料的利用率并不高。另外,部分学者调查采访沦陷区留日学生健在者的工作进展有限,且被采访者年事已高,更增加了采访工作的紧迫性。

因此,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留日学生,首先要勇于发掘和善于利用新史料。潜心研读现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东洋文库等处的事关沦陷区留日学生的档案史料;广泛搜罗沦陷区留日学生的笔记、回忆录、文集等史料;抓紧采访沦陷区留日学生健在者,及时整理其口述史料,进一步拓宽史料来源。然后,结合时代背景,进行史料佐证和对勘,还原真实的抗战时期沦陷区留日学生史。其次,不断发现学术新问题,拓宽研究新领域。目前,沦陷区留日学生的研究,大都仅限于伪政权留日学生的选派、经费、留日政策等内容,很少涉及伪政权留日学生在日本的留学生活,以及他们回国后的活动与影响。虽曾有人提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各伪政权留日学生的甄别和审查,却几乎无人谈到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国家建设的积极作用与贡献。再次,应将沦陷区留日学生研究置于殖民教育史研究范畴之中,否则,缺失或忽视

沦陷区留日学生研究的殖民教育史是不完整的,也无法全面揭露日本殖民教育的手段和用心。最后,坚持客观公正原则,评价沦陷区留日学生的功过是非。不能因为是伪政权选派的留学生,或是抗战时期赴日留学,就一概否定或全面批判;而应根据他们在抗战时期和新中国建设中的具体表现,实事求是分析,客观公正评价。

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谈沦陷区口述史资料及口述历史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对两方面史料的挖掘可以说成绩较大,一个是图像史料,一个是口述史料,有人形容为“图说史大出风头,口述史一枝独秀”。在抗战时期沦陷区口述史资料及口述史研究方面也有不菲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在战争受害及战后遗留问题、国民党将领抗战、日本殖民侵略等方面。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沦陷区口述史料的挖掘和口述历史研究的视角比较狭窄。抗战口述史的兴起应该说一定程度上与战后遗留问题的重新提出以及对日索赔诉讼有关,因此,一开始关注的视角更多地是在战争受害方面,挖掘了大量的口述材料。由于这方面的材料太集中,并带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所以,有学者批评这种口述史是“忆苦思甜”型(确切地说应该是控诉型)。虽然这种批评有失偏颇,但也不无道理。近年来这种局面有所改进,但需要继续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口述史追寻的是历史著述之外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民众的历史,而这种历史是非常丰富的,也是非常生动的。故而,今后在挖掘口述史料以及撰写口述史方面,我们的视角应该更宽泛。

第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简单地以口述史料代替口述史,不仅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著作,而且缺乏从学术立场出发对口述史料、档案文献作综合分析从而得出重要历史结论的学术著作。事实上,在西方,“口述史料”与“口述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二者之间是有着严格的区别。但是,由于国内具有现代意义的口述史研究起步晚,起点低,特别是抗战口述史一开始焦点就集中于战后遗留问题上,而这方面文献的缺失使得许多学者只能从职业化的需要简单地将口述史理解成为研究“查漏补缺”,把口述历史研究理解为单纯的口述史料积累,缺乏学术目的和学术方向感。历史研究是多元的,口述史料不能代替文献史料,口述史料也不能代替文献史料,只有从历史研究者的责任出发,将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结合,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民族共同的历史,口述史料及口述历史才真正具有其学术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幸存于世的亲历者越来越少,沦陷区口述史料的采集工作必然也会结束,工作重心应该转向对已有的口述史料的研究及相应的历史研究方面,只有树立这样的学术意识,沦陷区口述历史研究才真正具有学术意义。

第三,口述史研究缺乏对历史学及其相关学科前沿的学术研究的关注和学术成果的吸收。前几年,国内口述史兴起时,出版界曾经出版过一些国外的口述史方面的理论著述,如唐纳德·里奇的《大家来做口述史》,应该说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从中吸取了不少的有益成分。但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具体的操作原则,对口述史理论方面的内容关注并不多。唐纳德·里奇在其书的前言中,曾经这样谈到口述史兴起的原因:“口述史家和公共历史学家们的兴趣正日益逐渐地从主流历史学的学术研究转向对记忆的研究,历史学家围绕这些公共记忆的主题,审视人们是如何从现实的利益出发来构建他们的过去的。当学者们逐渐意识到集团记忆能够保存或是歪曲一个社区的过去时,他们对口述历史的兴趣与日俱增。口述史家的主要工作是研究人们为什么和怎样记住和描述他们的过去,记忆中都有些什么内容。”但是,目前国内抗战史学界对口述史关注的更多是后一句话,即“记忆中都有些什么内容”,却忽略了对“为什么和怎样记住和描述他们的过去”的关注。当前,对记忆包括社会记忆和个体记忆

的研究成为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共同关注的研究课题,近年来,国内也出版了哈布瓦赫的《论集体记忆》、哈拉尔德·韦尔策编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等书,但真正从事口述史研究的学者对这些问题缺乏关注。人类的记忆是有选择的,在沦陷区口述史研究中,作为战争记忆的重要形式或者说作为战争记忆载体的口述史,没有学者去深究这些口述史料或者口述史内容,哪些是社会记忆,哪些是个体记忆,它是如何形成的,它在构建一个民族的历史认同,塑造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方面有什么意义,等等。以纳粹大屠杀为例,西方学者围绕这个问题,已经从对史实的追寻上升到研究这段历史记忆对德意志民族的历史认同、历史意识方面的影响。而作为与纳粹大屠杀具有同样分量的南京大屠杀,不仅至今缺乏一部有分量的著述,而且更缺乏对南京大屠杀记忆的研究。口述史是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具有紧密联系的学科,只有吸收相关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有深入的口述史研究。只有将记忆转变为历史意识,口述史才真正获得了它应有的历史意义。

丁贤勇(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以战养战”:以1944年《浙江省经济便览》为例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大片国土沦陷,在浙江可以分为先后沦陷的两个区域。一是到1937年底,杭嘉湖平原成为沦陷区,该区域几经漫长的8年沦陷岁月;二是1940年以后,特别是浙赣战役后,钱塘江南岸地区成为新沦陷区。日军对浙江沦陷区之统治,与东北等早期沦陷区略有区别,其掠夺性更强,对当地社会经济破坏更大。1944年12月,日军浙江省连络部为纪念侵占浙江7周年,整理了《浙江省经济便览》内部资料(浙江图书馆藏本,封面有“军事极密”的红色楷印),从中可比较系统地发现浙江沦陷区的社会经济情况。

首先,日本军事侵略对浙江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如,战前杭州的丝绸技术,堪称中国第一,年交易额高达2500万元,至此降至二三百万元。战前吴兴县到处可见桑园,六成农民从事养蚕业,城内有工厂30余家,月产生丝7万担、绸布5万匹,产品远销欧洲各国;至此产量无法正确统计,据闻为生丝400担、绸布6000匹。又如,战前浙江杭州和宁波的近代工厂,因日方管制电力、原料等,大多雪上加霜,几乎处于停业状态。再如,战前在中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浙江金融业,有银行业20家、钱庄37家、证券业1家、典当业14家、保险业57家,因战争冲击和破坏,几乎损失殆尽;战时新设的金融机构仅正金银行出張所、华兴银行杭州支行、浙民银行以及公济当。曾有中国交通银行及钱庄26家的吴兴,战时仅余银行1家、钱庄7家。还有对都市的破坏,如战前杭州约60余万人,因战争流散至各地,人口减少1/5,至1944年4月仅有44万人。

其次,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据《浙江省经济便览》“序言”云,浙江“要作为共荣圈组成体之一,分担粮食及工业资源之供给,以成为新颖计划经济之对象”。如盛产粮食的两嘉平地区,1943年米谷年产量约为3309500石,仅军米一项日方就掠夺310000石。浙东地区原本产米较少,尚不足当地消费,即使如此,日军仍在1944年青黄不接的1至5月掠夺当地大米315吨。日军将沦陷区各盐业机构均置于特务机关监督管理之下,并成立专营之商社,控制食盐的产销运营。日军还在舟山群岛组建了“宁波水产合作社镇海支社”、“浙东区鱼市场股份有限公司”等机构,统一管理水产产业。

第三,以军事手段控制能源、资源,实施以战养战。如,为迅速、顺利地大量“对日还送”所不可或缺之重要战争资源——萤石,日军主持修建金(华)武(义)铁路,并于1943年5月招聘日本技术人员赶工,不到一年后的1944年4月26日便开通了。沪杭间的电报,1940年8月改为有线,为稳定通讯状态,1942年9月改为自动通信。这些交通通讯设施均在日军直接控制之下。长兴石灰石矿区由上海水泥公司及日华矿业采掘。前者采掘量为每月7000吨,后者为3000至4000吨,利用

水路运至上海,月运矿量合计 8000 吨左右。在上海制成水泥后,大部分供给军用。日军投降时,日伪政府为开脱罪责对档案“毁尸灭迹”。因此,现存的沦陷区档案史料稀少,《浙江省经济便览》是一份反映日伪对沦陷区无情掠夺实态的自供状。

### 潘国旗(杭州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战时省公债评析

抗日战争爆发后,各省的地方财政困难加甚。接近战区及一部分已沦为游击区的省份,一切政务均已特殊化、军事化,军事费用常居地方支出之最大项目。后方各省,为办理防空、军训及救济等,军事费用为数亦巨,成为地方财政之重累。因此,军事支出与非常支出在各省支出中占特别重要之地位,如江苏省在 1939 年度岁出概算中,列有此类支出共计 1000 多万元,约占岁出概算的 70%。战时地方政府的支出无限膨胀,而当时的税收收入因战争关系不增反减。像各省的田赋和营业税,因战区的扩大和大都市的沦陷,日趋减少。当时省财政的这两大柱石,都已呈动摇之兆。其他税收,如酒税、锡箔税、契税、房捐等无不锐减。于是,财政亏短(赤字),成为各省财政概算上的普遍现象,这项亏短之数有的省份占全部支出的 80% 以上,各省平均达到全部岁出的半数,大概比战前增加了一倍。仍以江苏省为例,1937 年约亏短 500 多万元,1939 年增至 1000 多万元。各省弥补财政亏短的办法主要有二,举借债款和请求中央补助,此外就是各省纷纷恢复类似厘金的通过税及产销税,往往重复抽取,以筹军饷。下面主要谈谈战时省公债的发行情况。

据初步统计,自抗战爆发至 1941 年底的 4 年半中(1941 年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后,省财政并入国家财政,故不再有省公债之发行),16 省的地方政府共发行了 37 笔公债,其中以福建省为最多,达 11 次,四川 5 次,广东和甘肃各 3 次,湖北、安徽和江西各 2 次,其他如浙江、江苏等 9 个省各 1 次。这 37 项公债,加上其他短期借款,总额达到 5 亿元。从债款的用途讲,大多用于生产建设、整理金融和债务、充实省库、弥补赤字、办理国防事业等,一句话,为筹措抗战经费而发行,所以,就总体而言,战时地方政府举借和使用公债的合理性应基本肯定。因前述战时各省平均高达 50% 的巨额财政赤字,不是单靠税收款项所能填补的,债款收入对各省弥补收支不敷有着极端重要性,有几个省份的债款收入占到其全部岁入的半数以上。可以说,离开了举债,有的省财政就无法维持下去。地方公债帮助我们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最终迎来了抗战的胜利。

当然,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限制,如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够发达,社会资本不够充裕,国民的储蓄普遍不多,国民政府的债信也不佳,加上残酷的战争环境等,这些都影响了公债的推销。所以,一方面是省公债的发行有增无减,另一方面是民众的消纳能力日趋枯竭,上述约 5 亿元的地方公债,绝大部分都不是由民众购买的,大都依赖地方银行为之承销或抵借,各省银行即以此债券为准备金增发省钞(1942 年 7 月前,国民政府尚允许各省银行发行一元纸币和一元以下的辅币券,故战争初期的货币发行并未完全统一,中央银行统一发行货币要到 1943 年才严格执行)。导致的结果是,抗战爆发后,各省地方钞票均有增发,故各省地方公债的发行,与中央公债一样,其结果间接的成为膨胀通货,马寅初称其为“烟幕下之通货膨胀”,即发行公债其名,通货膨胀其实。而随着通货膨胀的日趋严重,法币的迅速贬值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使他们承受了沉重的剥削。至于对战时国民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的全面评价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兹不俱论。

### 李淑娟(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从社会史角度拓宽东北沦陷史的研究领域

伪满沦陷区与其他沦陷区的不同之处是,它是日本对华殖民侵略的实验地,也是日本全

面侵华战争的基地,又是以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形式面世的,时间长达14年之久,贯穿大陆抗日战争的始终。因此,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东北沦陷区成为战争的重灾区。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学术界尤其是东北学者极为关注,目前已经取得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与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求相比,东北沦陷史研究还处于不尽理想的境地。还有许多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处女地和空白点,我们对许多问题的研究还没有展开或者处于刚刚起步阶段,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首先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嫌不够,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事实层面研究多于理论研究,这方面需要大大拓展和深入。其次,受资料所限,对日军的罪行及其造成的后果缺乏全面、准确的调查统计,在很多问题上还拿不出准确的调查统计材料和证据,从而给日本否认这些罪行留下可乘之机。那么,东北沦陷史研究怎样才能建立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求得进一步深化和发展呢?

从社会史角度拓宽东北沦陷史的研究领域,是深化东北沦陷史研究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史学界对东北沦陷史的研究,大都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入手,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既为社会史研究奠定了深厚基础,也为社会史研究留下了广阔空间。如果从基层社会的角度来研究东北沦陷史,更有利于揭示历史的本质和全貌。尽管关于社会史的定义、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世界各国学者没有一个一致的看法,但我们完全可以借鉴他们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开辟更广阔的研究领域。

对于东北沦陷区的基层社会——伪满农村的社会状况及农民生活,应给予足够的重视。东北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日伪统治时期的东北,农业人口占80%以上,日本统治东北十四年间制造的惨案、集团部落和“无人区”的建立,对农民土地的大量占有,对粮食等农产品的掠夺,对劳工的强制征用,鸦片毒化政策的实施,日本移民开拓团的建立等,主要是在广大农村进行的,因而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村最具典型意义。东北沦陷史研究尽管成果丰硕,但以农村为特定研究对象的成果实不多见,对农民这一巨大群体的遭遇和生活状况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有关东北农村的一些研究领域至今还没有涉猎,有些问题的探讨还不够深入。

关于东北沦陷区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整个东北仅4个月零18天即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由于战时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所有的东北人包括地主、汉奸、市民、知识分子和农民各个阶层在内,生活都发生了变化,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乃至社会风俗、宗教信仰、民众心理等,对此,我们的关注显然不够。以往,我们过多地强调日伪对东北的殖民统治,而对东北沦陷时期人民的生活实态,包括衣食住、生产、生活收支状况、人民负担、物价、人口、教育、捐税等情况研究不够。其实,通过这些细节变化,最能说明本质问题。如果我们对人民的生活状况和人心背向有清楚的认识,就不难理解日伪的殖民统治必将走向灭亡,进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必将取得胜利有更深刻的认识。

东北因战略地位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亦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斗争乃至国际斗争的重要地区。从现实所处的国际环境看,在未来年代东北对中国的领土主权及安危仍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时至今日,日本虽战败65年,但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仍在活动,东北地区依然潜伏着某种战争危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乃至将来,东北仍不失它的战略地位。因此,大力加强东北沦陷史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保持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加速东北地区的发展,是十分迫切和重要的。

高晓燕(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东北沦陷史研究的回顾与实证性调查

### 一、东北沦陷史研究回顾

1986年正式启动东北沦陷史研究,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6至2002年。1986年10月,在长春成立了《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以吉林省委书记于林为主任委员、辽宁省委书记李荒、黑龙江省委书记李剑白为副主任委员。编委会下设总编室,东北三省分别组成辽、吉、黑编写组,共同开展《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的研究工作。第二阶段:从2002至2006年。2002年6月,胡锦涛同志就东北沦陷史的工作做出了“此事意义重大,建议请三省继续进行工作”的重要批示。同年8月,长春工作会议明确东北三省进一步分工合作,推进东北沦陷史研究。第三阶段,从2006年2月起,吉林省重新启动《东北沦陷史》“综合卷”编纂工作。以吉林为主,聘请辽宁、黑龙江部分研究者参加。20多年来,东北三省史学工作者对东北沦陷史各个领域进行了深入、系统地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是编撰、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1991至1995年,出版专著26种32册,约1400万字。1996至2002年,出版23册。这些著作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二是创办《东北沦陷史研究》。由三省编写组共同出资,1996年末创刊,到2004年春,共计出刊30期,每期报送中央、三省领导和有关部门。虽内部发行,但受到国内外好评。三是培养锻炼出一批研究东北沦陷史的学者队伍。除东北三省社科院学者外,还有各高等院校、博物院、党史研究室等单位学者参加。

### 二、沦陷史研究中的实证调查

东北地区经历了长达14年的沦陷时期,战后留下了大量的遗址遗迹,成为历史研究的实证调查对象。实践证明,历史学的实证性研究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一方面可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另一方面可以鉴别文献资料的真伪。东北三省专家学者在20多年研究中重视实证性调查,搜集了大量的东北沦陷史第一手资料。

一是侵华日军边境要塞问题。日本占领东北后,把侵略目标指向苏联。在东北边境地区建立了琿春(五家子)、东宁、绥芬河、虎头、黑河、瑷珲、海拉尔等17个军事要塞。由于这方面文献资料较少,通过实地考察等实证性研究,出版了《日本关东军要塞》等一大批成果。同时,日军强征劳工和慰安妇问题,也在实证性研究中挖掘到了大量资料,出版了《东宁要塞》《残害劳工》等学术著作。

二是日本移民问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向东北移民。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又提出“百万户移民”计划。1938至1943年,移来8万户约有50万人口。黑龙江省的牡丹江等地是日本开拓团的集中地,经过实地调查,征集大量珍贵口述资料,补充了史料不足。此外,还有日本“遗孤”、“残留妇女”等问题,也通过实证性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如出版了《日本遗孤调查研究》等著作。

三是日军细菌战问题。日军细菌部队的大本营——七三一部队就在哈尔滨平房区。下设牡丹江、林口、孙吴等支队,还有大连卫生研究所、长春一〇〇部队等细菌战相关机构。对日本细菌战问题的实证研究集中在对其建筑遗迹的考察与对受害者的采访上,代表性成果主要有《日本关东军宪兵队“特别输送”追踪》《731部队细菌战贻害研究》等。

四是毒气战问题。黑龙江省社科院最早进行了日军毒气战问题研究,在充分挖掘中日档案资料的同时,进行大量的实证性考察。从日本研究化学毒剂的研究所(东京)到制造化学武器的工厂(广岛);从培养化学战人员的学校(习志野)到侵华毒气部队遗址(齐齐哈尔);从施放毒气的战场(山西)到战后遗弃毒气弹的现场(吉林)都进行了实地考察。尤其通过对战后受害者的采访,编撰了《日军遗弃的毒气武器——中国受害者的控诉》一书,成为中国受害者

进行对日诉讼的依据。

车霁虹(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台湾实施保甲制度比较研究

近些年来,在沦陷区研究中也兴起了比较研究。其中,有同是沦陷区的伪满政权和汪伪政权的比较研究,有同为日本殖民地的“满洲国”和台湾,以及朝鲜、关东州等的比较研究,以此揭示日本在这些殖民地的统治政策有何不同或相同之处。例如,台湾与朝鲜皇民化运动的比较研究,日语普及运动的比较研究,日本在台湾和“满洲国”经济统制的比较研究等就是代表性的选题。

欲系统、深入研究日本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政策,就必须涉及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台湾推行的保甲制度。日本在东北推行保甲制度源自于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经验。陈小冲在《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中提到日本在台湾殖民统治的几个基本特征,其一是在台湾建立了总督专制独裁统治;二是形成了严密的警察统治网络;三是复活了封建的保甲制度,体现了日本殖民地政治统治的残暴性。

1898年8月31日,日本殖民当局在台湾颁发《保甲条例》规定保甲作为警察军事统治的辅助组织。以10户一甲,10甲一保,全保全甲内部连坐,保甲另外组织壮丁团,接受警察当局的指挥、监督。保甲制度在台湾被日本称为后藤新平在台最具独创性的一项施政,尤其是“壮丁团对于土匪之镇压有很大贡献”。1903年7月全台共有4815保,41660甲。到1943年,全台共设6074保,58378甲,控制50余万户,壮丁团团丁最高时达到134613人。保甲制度作为日本殖民者对台湾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其实质是用“以台制台”的方式控制和奴役当地中国人,保甲制度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基础。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于1933年12月22日在伪满洲国颁布了《暂行保甲法》。该法主要内容保甲制度组织、保甲连坐规约和自卫团组织三部分构成。据统计,1934年12月在“满洲国”983个警察署下有1267保、22403甲、314306牌,控制了约565万户居民。1935年伪满基层设置的自卫团9861个,自卫团员1774000人。

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台湾实施的保甲制度比较起来,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伪满保甲制度是台湾保甲制度的继续,是日本殖民统治经验在东北的再次体现,但两地实施保甲制的时间长短不同。台湾的保甲制度长达40余年,而东北的保甲制度仅推行4年,于1937年12月被《街村制》所代替,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在两地殖民统治方式的差别。

保甲制度作为统治阶级巩固政权、束缚民众自由、稳定社会秩序的一项统治政策由来已久。日本帝国主义在殖民地推行的保甲制度并非其首创,而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利用保甲制度控制人民的继续。然而,日本所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都体现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意志,并为其殖民统治服务。因此,其在中国东北和台湾推行的保甲制度不仅仅是一般政权的行政措施,更是日本法西斯殖民政策的体现,并深深地打上了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烙印。

李倩(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东北抗联研究评析

东北抗日联军及其前身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共经历了14年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对东北抗日斗争史、东北抗联史的研究被划为禁区,谈不上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建国40年时,国内尚没有相关的权威性学术著作问世;而这一时期,国外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却异常活跃,且有许多著述问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事实

是的优良传统得以恢复,为我国东北抗联的研究提供了机遇。

随着档案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抗联研究进入了新阶段。

东北抗联史料的挖掘和整理。1988—1992年中央档案馆等编的《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印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李铸等译的《东北抗日联军资料》吉林省档案馆编译的《东北抗日运动概况》等,为抗联研究提供了具有较高价值的史料。

伴随史料的挖掘和研究的深入,相关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6年,孙继英等编著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丛书》(八卷本,2005年修订版)、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所著《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孔令波的《东北抗日联军》、张洪军的《“九·一八”全史》第三卷、王晓辉的《东北抗日联军抗战纪实》中共吉林省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吉林历史》等著作;还有李鸿文的《全面评价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和王连捷的《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若干问题的研究》等论文,这些论著记录了抗联各军的发展、建设、战斗和无数英雄人物的杰出事迹,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团结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关于抗联人物。步平、王希亮的《抗日英烈传》谭译主编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吉林省民政厅编的《吉林革命英烈》黑龙江社科院党史研究所等编的《东北抗日烈士传》、赵俊清的《杨靖宇传》等,真实地反映了东北抗日斗争的历史事实和烈士们的本来面貌。

关于抗联与中央的关系。尚金州在《浅谈东北抗联对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著作学习和贯彻的意义》《毛泽东与东北抗日联军》等文章中,指出毛泽东一直重视和关心东北抗联,而抗联及其领导人也力图把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贯彻到东北地区的抗日斗争中。事实上,尽管中共中央和抗联在组织上长期失去联系,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却一直关心着抗联。而抗联及其领导人也全力收集党中央文件和毛泽东著作,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

关于抗联与苏联的关系。李鸿文在《论全国抗战爆发前,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战争》《论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国际、苏联与东北抗日斗争》等文章中,指出应正确看待苏联对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态度,既要充分肯定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方面,也要批评其损害中国抗战和中国主权的方面。

日本学者的研究起步较早,自1960年以后相继出版的代表性著作有加藤丰隆的《满洲国警察小史》(满蒙同胞援护会,1968—1976)、满洲国军刊行会编的《满洲国军》(兰星会1970年)、满洲史研究会的《日本帝国主义下的满洲》(御茶水书房1972年)、浅田乔二等编《日本帝国主义的满洲支配》(时潮社1986年)、江口圭一的《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和铃木隆史著《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塙书房1992年)等论著,都在不同程度上暴露了日本军警的野蛮与残忍,并透露出中国各族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精神。

目前,我国学者虽在研究抗联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如对抗联的评价有失公允。抗联在残暴的日伪军警的疯狂镇压和冰天雪地以及缺衣少食的艰苦环境下,开展游击战争,付出了巨大代价,应该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共中央和抗联的关系,长期以来形成了一些不客观的认识,而目前的研究相当薄弱,有待进一步加强。

张正(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及七三一细菌部队研究综述

1989年,《侵华日军细菌战与毒气战》的出版,震惊了世界。之后,中日两国人士联合调查,经过20年的艰苦努力,围绕侵华日军细菌战、日军七三一细菌部队罪行及战争遗留等问题,出版了一

批学术论著。笔者认为,已有研究中今后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还有以下。

一是关于七三一部队活体试验人数的研究。以往根据1940至1945年间七三一部队受试者体检x光线照片编号统计是3000人,七三一部队在此之前所作的人体试验和其他6个大的细菌部队及60多个分队所作的人体试验人数由于受资料所限,并未计算在内。故有待发掘史料继续研究。

二是日军细菌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战致死的人数。日军细菌部队在中国除东北以外,在华北、华中、华南、云南等地都进行过细菌战。据《细菌战与毒气战》一书统计:因日军细菌战而死亡者为27万人,其中不包括军人的死亡人数。此外,这也仅是当时当地的死亡人数,不包括向外传播后死亡的人数。还有,农业细菌战造成各地的大饥荒死亡的人数更是没有统计。由于资料、访谈对象的种种原因所限,这一问题尚无确切结论。

三是关于细菌战的遗害问题。七三一部队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用各种方法投放过多种细菌,不仅在当时造成大量中国人的感染和死亡,而且遗害无穷。如1942年,日军在浙赣战役中使用了细菌武器,不仅当时造成了中国军民的大量伤亡,而且战后仍有数百名患炭疽未死的老人,病症复杂,难以诊断。另外,目前我国当年日军进行过细菌战的地方,有一些老人得的烂腿病,久治不好,有学者就提出与早年的细菌感染有关,但还需进一步核实,方能予以佐证。

日军细菌战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进行的,战败之际,又进行了毁灭证据,并向七三一部队成员发出《缄口令》;在日军进行细菌战的许多贫穷落后的村落或地方,整个疫区的人都死完了,无法取证和得到准确的数字。这些情况都造成了深入研究的困难。虽有七三一部队成员在良心驱使下曾揭露过一些事实,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留世者已经不多,且已八九十岁。因此,除了挖掘文字资料外,从这些人以及他们的后代中获得第一手资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刘敏(佳木斯大学赫哲族历史文化研究所)应重视和加强对东北沦陷区少数民族问题的研究

笔者感到学术界对东北沦陷区少数民族问题研究不足,甚至匮乏。在为数不多的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中,历史叙述性论著较多,理论性研究与深入探讨较少;专题性研究较多,综合性研究较少;重复性研究较多,创新性研究较少。这就制约了东北沦陷时期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向更深层次的发展。

事实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并对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民族歧视政策,给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如,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就对赫哲族采取了强制编成“山林队”和“伪警察队”、“大归屯”、发放吸烟证等殖民政策,致使赫哲族人口急剧减少。1945年日本投降时,生活在三江流域的赫哲族人口由1930年的1180多人,减为460余人,人口下降率为61.02%。赫哲族人口在短短14年中遭到重大损失,使其在世居地上成为人口较少的民族,并改变了人口分布地域格局。

日本的民族政策还严重地破坏和阻碍了赫哲族原始渔猎生产和生活。如赫哲人捕鱼狩猎要受到严加限制,稍有可疑行为,则逮捕审讯,严刑拷打,直至杀害。赫哲人只有以“冬青”、野菜为食,以麻袋片为衣,以围拢篝火御寒,其经济濒于崩溃边缘。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主要集中在三江流域,使该地区人口数量剧增,人口结构发生变化。赫哲族原始的生产、生活环境受到冲击,其以渔猎为主要特征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传统婚姻结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人口数量与质量、语言与文学等方面均遭到破坏。日伪政权对赫哲族14年的殖民统治,不仅将赫哲族人口推向了灭绝的边缘,更给赫哲族社会发展带来了灾难,并引发了赫哲族历史文

化的流变。

以往学术界对东北沦陷时期赫哲族等少数民族的上述情况缺少系统研究,而这一研究又是东北沦陷区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针对东北沦陷时期少数民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为了推动研究深入,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应注意以下两方面问题。第一,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应注意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综合运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与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宗教学、心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相结合,以达到对民族社会问题的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进而揭示其实质与规律。第二,在研究视角上,应在日本侵华、殖民统治和中国人民抗战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加强对东北沦陷区少数民族个案研究,即要重视他们为中华民族赢得抗战胜利所作的英勇贡献;更应重视日本侵华与殖民统治给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对少数民族人口繁衍、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影响,力求做到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以便形成对东北沦陷区少数民族社会问题的全面、科学认识。

张丽(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关注东北沦陷区民众的生活实态研究

以往学界研究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对东北的经济掠夺及破坏,主要侧重于土地、矿产、森林等资源的研究;虽对战时民众的生活有所涉及,但限于史料搜集和整理不足,制约了研究的进展,至今没有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此外,在描述沦陷区民众的生活状况时往往使用“苦难”、“悲惨”、“暗无天日”等话语来形容,此种表述既缺乏具体翔实的资料支撑,又令人难以置信。如何最大限度地还原东北沦陷区民众的生存实态,亟需在资料挖掘上找到突破口。

东北沦陷时期的报刊记载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研究。笔者近两年通过翻阅大量日伪统治时期的报纸,如《滨江日报》等,发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该报虽为适应“日满协和”的高调,为炫耀“王道乐土”,站在讴歌伪满的立场上,但其公布的大量统计数字,却反映了日本的战争意图,是日本侵略中国和殖民统治东北的历史铁证。

如报纸中有大量关于日伪统治后期(1941—1945年)推行物资“献纳运动”的记载。日伪统治后期,日本深陷战争泥沼,各类战争物资严重匮乏,特别是消耗巨大的钢铁和有色金属频频告急。日伪统治者为了筹集军需物资加速了对民间百姓的搜刮,强制推行“献纳运动”,且不断颁布各项“献纳”政策。如,《战时紧急经济方案纲要》《捐献金属处理要纲》《金属献纳强调要纲》《金属类回收法》《金属类回收法施行规则》等措施陆续出台。日伪政权还通过无线电新闻和报纸,大力宣传支援“圣战”的意义。如,在《滨江日报》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宣传标语:“白金可以杀美英,尽快献纳”,“献纳白金无异于挺身杀敌”,“白金装饰无甚美观,献纳杀敌实足快心”等。日伪政府还制作各种传单、标语及招牌,贴到商店门口和主要建筑物上,向市民宣传“金属献纳”的重大意义。

从报纸记载可以看出,日本已经把掠夺对象转向民间,“献纳运动”已经渗透到城乡的每一个角落,涉及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征集对象上至伪满皇帝、官员,下至贫民百姓,无一幸免。为此,日伪政府采取很多强制手段,如每家每户限定额数,限期收缴,逾期不能完成者予以重罚。一些贫民无力献纳,为免去惩罚,不得不到黑市上高价买金属上缴。到战争后期,从人们日常生活的炊餐用具到家用小五金一切铜铝铁器具,皆在献纳之列。《滨江日报》1944年11月7日有这样一条记载:“尤其像以下各种物品,希望一个不剩的,全部献纳。”含铜或铜合金的:门窗钩、烟筒、乐谱架、点心制造器、镶在墙上的合金板、蚊帐钩、隔板、铁栅栏、匙、刀、金属制品隔栅、照明器、床及其附属品、铃、金属门窗框、钟及钟钩、电扇、铜像、像座、水桶、排气管、佛具、黄包车之装饰用金属、房顶四角所镶之金属板、门柱、金属制壶等;含铁的物品:摆设品、烟具、车踏板、吊板、暖气装饰用金属

品、门柱、火盆等均在献纳之列。由此可见,民众的日常生活深受战争影响,反映出日本为满足对外侵略战争的需要,对民间百姓的掠夺是无孔不入。

因此,研究东北沦陷区民众的社会生活实态,应重视对报刊的挖掘整理和利用,以期从更微观、更真实的角度为东北沦陷区民众的生活状况研究提供资料依据和支撑。

郭常英(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进一步深入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史研究

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化内容广泛,是非常时期特定区域的历史存在,既是沦陷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抗战时期文化史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来,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学术界开始从研究战争的本身深化到研究与抗战相关的各个领域,以往不曾涉猎的沦陷区文化与社会生活开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笔者注意到,在200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后,沦陷区教育、报刊、戏剧、文学和知识阶层等方面成为抗战史研究的新领域。研究内容上也有了深化,如对日伪政权文化政策的考察以及沦陷区民众社会文化心理的分析等。但与更为广泛的文化领域相比较,目前沦陷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还有许多方面有待深入:如不同区域的发展特点、不同时期的发展态势以及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政治态度及其行为方式等,通过加强比较研究,可能更能揭示问题。有些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挖掘史料,科学分析考证、深入思考才能得到完善。

日本为了实现在占领区的统治,他们知道仅仅使用武力无法真正实现对占领区的有效统治,因此,在武力侵占的同时加强文化侵略,通过非物质的思想文化的影响,牢牢控制民众的精神和心理。当时的文化侵略方式,在新闻、广播、图书、电影、音乐、艺术以及文学作品各个领域广泛存在,不同领域的渗透程度不同,给人们造成思想认识上的冲击和社会生活上的影响也不同,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此外,目前的研究虽然关注到侵略者在不同领域中的做法及其影响,但资料的缺失影响了研究的深度,因此,广泛深入地发掘整理各类资料,是一项重要工作。

沦陷区民众对异族统治的接受状态,同样也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日本侵略者通过种种手段进行文化输入和思想控制。这种文化侵略对沦陷区民众社会生活有相当程度的影响,但如果把当时存在的部分人对侵略者的容忍与合作都看成是日伪政权“奴化”教育的结果,这未免简单化。大量史料表明,在不同的沦陷区,日本侵略文化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东北三省沦陷区被日本侵占时间较长,其他沦陷区被侵占时间或长或短,总体上看,各区域表现出的对日本侵略的接受程度有明显的不同。在一些被日军较早占领的沦陷区,由于日伪政权的长期统治,统治秩序逐步建立,生存压力之下的人们,自觉或被迫地选择对日本侵略者的容忍与合作,已成为一种较多存在的现象。虽然已有研究者对这种现象从社会心理的角度进行分析——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探索,但这显然仍不完备,我们应当把它放到整个社会大背景中去考察,它包括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们自身的社会存在,因为这种现象应该有其一定的思想根源。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侵略者对他国社会的种种渗透及其造成的后果是非常恶劣的,不是只用一句侵略者“奴化”教育的结果就可解释和概括的。

沦陷区文化包括日伪文化和抗日文化,在日本占领期间,沦陷区内始终存在着相对立的文化交锋。因此,沦陷区文化不完全是日本在沦陷区的统治文化,它是由多层次、多元素构成的文化。所以,加强沦陷区文化研究要扩大视野,不仅要研究日本侵略者在沦陷区的文化统治问题,同时还要研究沦陷区的民众是如何反抗这种文化统治,如何应对侵略者的文化侵略的,只有这样才能对沦陷区文化做出全面和准确的诠释。

张艳(河南大学近代中国研究所)关于加强沦陷区社会史研究的思考

近些年来,随着抗战史研究的深化,沦陷区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出版和发表了大量论著。不过,总体来看,与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的研究相比,对于沦陷区的研究和资料整理明显不足,特别是对沦陷区社会史的研究更为薄弱。因此,关于沦陷区社会史的研究是富有挑战性的学术选题。本文就此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社会构成如人口结构、婚姻和家庭模式、社会的阶级和阶层、社会关系体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是沦陷区社会史研究应该关注的内容。对人口及其构成的研究是认识社会结构的重要基础,许多社会问题都与人口结构有很大关联。日军在中国沦陷区通过战争屠杀、制造无人区、掠夺劳工等方式,不仅造成沦陷区人口减少,而且对沦陷区人口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日军侵略带来的沦陷区人口职业结构改变、人口贫困化、人口文化素质下降、性别比以及日本在沦陷区的移民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等,都是沦陷区人口史研究中应该关注的问题。沦陷区的婚姻家庭也是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家庭是社会共同体中的初级单位,通过对沦陷区婚姻家庭的研究可考察侵略战争给沦陷区社会结构带来的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沦陷区的社会阶层关注较多的是汉奸和伪军群体,其实,还有许多社会阶层和群体如农民、工人、商人、知识群体(包括教师、医生、新闻工作者等)、流民、会党等,在日伪的统治下,他们各自的生存状态、思想意识、社会心理等都发生了变化。这些阶层和群体在有关沦陷区的文学作品中描写比较多,但尚未进入学术视野,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抗战时期汪伪政权在沦陷区建立了一些社会团体,如农会、渔会、工会、商会、工商同业公会、学生会、妇女会、帮会团体、慈善团体等等。这些团体是沦陷区社会构成的重要部分,在某种程度上是日伪政权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然而,它们在沦陷区研究中鲜有涉及。通过研究这些团体,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日军对沦陷区民众实行殖民统治的途径,而且有助于深化沦陷区社会史的研究。

作为沦陷区历史的一部分,沦陷区社会生活史也需进行深入研究。沦陷区民众处于被奴役的地位,日军的侵略完全打乱了民众正常的生活秩序,衣、食、住、行和日常娱乐、生活习惯都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年轻女子出门不能像过去那样穿得花花绿绿,脸不能像过去那样洗得干干净净,不但要穿得破烂,而且脸上要涂抹锅灰,不能打扮得漂亮,而是要打扮得“丑陋”。如果对沦陷区与根据地、国统区以及沦陷区中国居民与日本移民的生活进行比较研究,就可使人们真正看到沦陷区民众的悲惨命运,从而揭露日本侵略者所鼓吹的“大东亚共荣”、“王道乐土”、“中日亲善”的虚伪性,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凶恶本质。另外,沦陷区民众的社会生活处于一种非常态的状态之下,沦陷区尤其是沦陷区城市的社会生活无不打上了日本文化的烙印,因此,日本军国主义文化对沦陷区社会生活的影响在学术研究中也是不可忽视的内容。

沦陷区研究不仅是复杂的学术问题,还涉及到中华民族的感情问题。因此,对沦陷区社会史进行研究时,还要注意研究者的立场和研究方法。抗战时期,日伪曾在沦陷区采取一些社会改革和社会救助措施,如日本人把一些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引入沦陷区城市,又如1942—1943年华北发生大饥荒,日伪在沦陷区开展赈济活动等,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城市的现代化和沦陷区社会的稳定,但我们不能因此而给予褒奖的评价,因为这些都是建立在对中国人民殖民统治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研究沦陷区社会史必须注意的问题。

曲广华(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与历史学院)近五年来抗战时期的文化研究述评

抗战时期的文化包括正文化和负文化。正文化指中国人民为抗日救亡而产生的的精神

产品和思想,诸如为抗战服务的史学、哲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学艺术(小说、诗歌、戏剧)、科技、教育、音乐、电影、美术、新闻、出版、广播、思想、理论,以及不同党派集团为抗日制定的文化政策和实施的文化建设;负文化是指在沦陷区日本帝国主义为奴役中国人民推行的殖民文化和汉奸文化。

2005—2009年,抗战时期的文化研究,主要方式有3种:

一是举办学术会议。代表性的会议有,2005年8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等单位与江汉大学联合召开了“救亡与发展: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2005年8月11日,重庆师大等举办了“重庆抗战文化研讨会”。同年12月,广西社科院文史所等几家单位在柳州联合召开了“广西抗战精神与抗战文化学术研讨会”。2007年7月,中国田汉研究会等单位在厦门举办了首届“海峡两岸抗战戏剧研讨会”。2009年5月23日,在重庆又举办了“文学史料与抗战文学”学术研讨会。

二是整理和出版抗战文化资料。如,涂文学主编的《武汉沦陷时期档案史料丛编——沦陷时期武汉的社会与文化》(武汉出版社2005年)、李建平主编的《抗战遗踪——广西抗战文化遗产图集》(广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钱念孙主编的《无法尘封的历史:抗战旧书收藏笔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年)、抗战文化丛书《抗战诗歌》《抗战时评》《抗战戏剧》《抗战电影》《抗战海报》《抗战照片》(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写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何开粹主编的《桂林抗战文化城诗词选》(华夏出版社2009年)等图书资料,都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抗战文化史主题。

三是关于抗战文化的研究成果。代表性的著作有,魏华龄等主编的《桂林抗战文化研究文集(八)》(广西师大出版社2005年)、袁小伦著的《粤港抗战文化史论稿》(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重庆分会主编的《重庆抗战文化史》(团结出版社2006年)、涂文学与邓正兵主编的《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建平等主编的《抗战文化研究》第一辑和第二辑分别在2007和2008年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目前,检索到的相关文章有近百篇。

总揽近5年的抗战文化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

第一,形成了两个抗战文化研究中心,一是广西桂林,二是重庆。这两个城市之所以成为抗战文化研究中心,与其抗战时期的历史地位密切相关。

第二,研究方向主要侧重于抗战时期文学艺术和中国共产党抗战文化政策、文化统战与文化建设。其中,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根据地的文化研究,大都与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联系在一起。

抗战时期的文化研究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第一,研究区域不平衡,南方多(特别是西南),北方少(特别是东北)。在现有抗战文化研究成果中,南方诸省如广西、四川、云南、广东、湖南、湖北等抗战时期的文化研究比较活跃,作为较早沦陷地区东北的学者,研究日本在东北推行殖民文化和东北人民抗日文化活动的成果并不多,且似有断层现象。

第二,对国民党在抗战时期的文化政策、文化建设措施等方面研究不足。抗战伊始,国民党就制定了相应的文化政策和措施,中宣部文化运动委员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等都是直接从事抗战文化宣传的机构,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如在大后方出现了某些类似桂林的文化城,不仅仅是聚集了大批文人墨客,更重要的是各种思想理论宣传也很繁荣,马克思主义著作和毛泽东文章的出版就是例证。因而,不能笼统地说国民党在文化方面就仅是专制一面,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王宏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拓研究日本对华毒品政策的新视野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指出,日本战争头目违反了国际禁毒条约,犯下了反人道的野蛮战争罪刑。关于日本在中国实施毒化政策的历史学研究起步较晚,大致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首先是资料的发掘与整理。在这一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日本爱知大学的江口圭一教授,他发现了曾任伪蒙疆政权经济部次长的沼野英不二带回日本的有关伪蒙疆政权鸦片事宜的文件,并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于1985年将这一批绝密文件编成一本资料集,即《日中战争时期的鸦片政策》。翌年,美铃书店出版了由日本学者冈田芳政等人合编的《续·现代史资料(12)鸦片问题》一书,该书收录了有关日本、台湾、伪满洲国及整个亚洲的鸦片文件。中国学者也非常重视资料的搜集与整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书中公布了伪满洲国的部分鸦片公文资料。另外,马模贞以《日本侵略者对我中华民族肆行毒化政策》为题,辑录了各地历史档案馆残存的部分资料。

随着相关史料的整理出版,历史的本相渐渐显露。江口圭一出版了《日中鸦片战争》,韩国学者朴檀写成了《中日战争与鸦片》。这两本书对于1937到1945年间日本在中国的鸦片政策,特别是蒙疆的鸦片生产、收缴和配销情况做了实事求是的描述。中国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了日本的毒化政策研究。台北学者李恩涵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5、27、29和31期上连续发表了4篇相关文章。与此同时,大陆学者利用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大量资料,对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推行的毒化政策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出版了10余部著作。

关于日本在中国占领区推行的毒化政策研究,无论从资料方面还是学术成果上来说,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也存在明显的缺点和不足:一是资料尚待进一步发掘和整理,二是研究视野需要拓宽,三是缺乏多学科交叉研究。

第一,历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对事实进行客观描述。而这种描述又必须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每一个结论都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支持。目前,史学界已经挖掘了不少中文档案、报刊资料 and 私人笔记,也整理和出版了一些禁毒史资料。但是,这些资料是很不完整的,远远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因为不仅中国的禁毒档案资料尚未得到完整的整理和利用,而且日本的贩毒资料亦尚未得到系统挖掘和整理。如果不能有效地利用日文资料,自然难以写好中国毒品史。

第二,毒品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国际问题。因此,关于日本对华毒品政策的研究,应当兼顾域外毒品史的研究成果。毒品的生产、供应和消费是一个完整的商业链条。近代中国只不过是一个重要的消费地而已,印度、伊朗是鸦片的主要产地,日本、德国是吗啡和海洛因的主要制造国,英国商人则是鸦片、吗啡和海洛因的主要输入者。因此,考量中国近代的毒品问题,不应将其范围仅仅局限在中国。不了解域外的鸦片生产、加工情况,不了解英国、日本、德国、印度等国的毒品政策,就难以深入把握毒品的世界传播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因此,我们的研究视野需要进一步拓宽。

第三,无庸讳言,以往相当多的研究成果存在就毒品而论毒品的倾向,过多地关注毒品的输入数量。事实上,毒品问题渗透着各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因素,毒品既与财政、货币和金融有密切的关系,又与医药卫生、消费心理和风俗习惯有无法分割的关系,因此,开展毒品问题的研究,不仅需要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而且需要心理学和医学知识。只有采用多学科交叉研究方法,才能真正认识毒品问题。笔者认为,毒品史的深入开展不仅依赖于研究者眼光的调整和学术识见的增强,而且需要集中具有各种知识专长的学者,形成知识互补,打通学科之间的藩篱。

袁成毅(杭州师范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国际社会聚焦日军空袭锦州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的大批军政官员移往锦州办公,似有继续抵抗之意,日本参谋部据此认为“只有消灭锦州附近的张学良势力,才有希望解决满洲事变”。1931年10月8日下午,关东军组成侦察机和轰炸机编队,相继在锦州上空投掷了75枚炸弹,炸死居民16人,重伤12人,这就是著名的“锦州轰炸”。

日军对锦州的轰炸一时引起了国际社会非常密切的关注和谴责。10月9日,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第一次向内阁会议通报了日军轰炸锦州的事件,并召见了日本驻美大使出渊,指出日本在锦州的作法违背了国联决议的精神。英国外交大臣里丁在给英国驻日大使的指示中表示自己“被轰炸锦州的报道搅得心烦意乱”。国联理事会也在国民政府的要求下将原订10月14日召开的会议提前召开。面对因锦州轰炸引发的国际关注,日本方面自己也承认“日军轰炸锦州,使国联空气恶化,对日本非常不利”。

对于国际社会聚焦日军空袭锦州的原因,中国学者过去的研究多认为此举标志着关东军欲进一步扩大侵略,影响到了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日美等国的学者则多侧重从关东军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解读。透过以上的解释,我们很有必要提出另外一个追问:从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到关东军完全占领东北,甚至直到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为何西方国家对关东军轰炸锦州给予如此强烈的关注?

其实,国际社会之所以聚焦锦州轰炸,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是日本军队实施无差别轰炸的第一次,事实上也开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差别轰炸。以往我们忽视这一点的原因在于它的轰炸规模和影响远不及后来日军在上海、南京以及在西南大后方等地的空袭,因此其标志性的意义也就未被注意。但对于西方世界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各国对敌国实施的无差别轰炸的战争记忆还历历在目,对于这种越出军事目标同时殃及平民的无差别轰炸,西方国家一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对这种新的战争形式的担忧,另一方面则是国际法对于这种无差别轰炸的限制一直未能形成。虽然早在1899年第一次海牙和平会议就提出禁止交战国轰炸无防守都市的概念,但此后便没有大的进展;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虽有法学家委员会提出了一些空战法规,但并未得到各国的采纳。因此,也未产生实际的效力。故而,战争中的无差别轰炸显然成了一个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而正是在这个关头,日军发动了对锦州的无差别轰炸,因此才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李学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重视和推动抗战影像史料建设

图像历来被认为是研究历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近年来,社会和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和重视图像的史料价值,相继出版了各种历史图像或老照片图书,对历史研究与历史知识的传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近年来,国际史学界中“影像史学”之说亦是方兴未艾。

抗日战争史学界最近也出版了一些相关专题的图像资料。这些图集既为抗日战争史研究与宣传提供了大量形象的图像资料,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局限与不足。一是数量不多。抗日战争时期摄影技术已相当成熟,许多中外记者和摄影爱好者拍摄了大量照片,但目前重新整理出版者不多,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更少。二是相互重复者较多。在已出版的各种抗日战争图片集或各地抗战纪念馆中,存在着大量相互重复的现象。

影像资料不仅是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的参考,而且也成为揭露日军侵华罪行的重要证据。当前抗战时期影像史料的现状,一方面说明社会和学术界对抗战题材的历史图片有相当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目前缺乏对此类史料的系统发掘和整理。

正如王国维所言,新学问的出现大都是由于新材料的推动,材料可以帮助方法,而材料的不同,又可以使做学问的结果与成绩不同。

有计划、有目的地搜集和整理抗日战争时期的影像史料(包括绘画、照片、纪录电影),全部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影像史料数据库,并以适当的方式提供给专业研究者参考,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译室近年确立的一个新的发展方向和工作计划。由于绝大多数老照片当时没有留下必要的文字说明,因此,需要对影像史料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基本历史要素信息,给予必要的整理、著录和分类。我们计划以3年为期,广泛搜集抗战时期的各种形式的影像史料,按照一定技术规范,进行数字化处理,建立相应的学术规范,并完成相关信息著录,为利用者提供准确的信息和检索手段。

在几代学者的努力之下,《近代史资料》数十年来整理编辑了大量重要的近代史料,为推动新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近代史资料》编译室近年来积极开拓新的史料领域,探索学科新的发展方向,目前已经陆续搜集了部分近代影像史料,并积极探索影像史料数字化和利用影像史料开拓史学研究新方法的形式。我们相信,这一计划的开展和持续推进,将会给抗日战争史研究带来许多新鲜的史料和研究课题,对于中国“影像史学”的建立与发展也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责任编辑:徐志民)